

周祖谟先生语言学学术思想述要*

杨建忠

内容提要 周祖谟先生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卓越的文献学家。周先生论著等身,成就卓卓,影响深远。总结周先生的语言学学术思想,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经深入研读《周祖谟文集》,文章从学理背景、学术特点、治学方法、学术精神四方面初步总结了周先生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 周祖谟 《周祖谟文集》 学术思想

周祖谟(1915年1月4日—1995年1月14日)^①,男,字燕孙,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北京)。音韵学“考古派”的代表人物,首批博士生导师。

曾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助理员,辅仁大学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国学季刊》《中国语文》《语言研究》编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顾问等职。

周祖谟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文字、训诂、文献等方面。

(1)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语音韵论文集》,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在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

(2)《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

(3)《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

(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1987:26)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扎实详赡”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关中古语音及《切韵》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

本文在研读《周祖谟文集》的基础上,总述周先生的语言学学术思想,以求教于学界。

* 基金项目: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百年浙江语言学家学术思想研究(第一辑)”(21WH70084ZD)子项目“周祖谟卷”(21WH70084-6Z)。

① 周先生生于民国三年甲寅,属虎,即公元1914年。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十九日,按公历算是1915年1月4日。解放后,对外以公历11月19日为生日,即把农历生日当公历生日。实际上,周先生生于公历1915年1月4日,活了八十岁零十天。参鲁国尧《人文大家周祖谟先生的学术成就》注引白化文《周燕孙(祖谟)老师二三事》(《北大熏习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载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傅杰《〈尔雅校笺〉重刊弁言》,载周祖谟《尔雅校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一 学理背景:根植传统,汲取现代

周先生治学之学理背景,可归纳为根植传统、汲取现代。周先生治学精于考据,长于校勘,治学精细,识见通达,成就斐然。

(一)根植传统

继承传统方法、理论。周先生幼年即熟读《千字文》《百家姓》《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等书。大学时,他深受沈兼士、罗常培先生影响,于传统语言文字学打下坚实基础,并以其为终生学术事业。大学一年级时,从罗庸学“中国文学史”,从马裕藻学“中国音韵学概要”,从沈兼士学“文字学概要”,从郑奠学“历代文学作品选”。大学二年级时,入“语言文字组”,从沈兼士学“《说文解字》”,从刘复学“语音学”,从钱玄同学“中国音韵沿革”,从魏建功学“韵书研究”“方言研究”。大学二年级时创作《〈说文解字〉之传本》,得沈兼士赞许,登载于《国学季刊》(5卷1期,1935年),此为其从事学术研究之始。1934年大学三年级秋季从罗常培学“语言学”“方言调查音韵学”及域外学者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从唐兰学“甲骨文和钟鼎文”。1935年大学四年级,毕业论文《〈篆隶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①导师罗常培。

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研究与典籍校勘一直是周先生治学的重心。如校勘《说文解字》,汇集各本,详加比勘,写成校记,辨正是非,著有《孙星衍平津馆重刊宋本〈说文解字〉校勘记》《〈说文解字〉之宋刻本——孙刻〈说文解字〉校勘后记》。并有《〈说文解字〉概论》《许慎的〈说文解字〉》《跋丁少山覆刻宋监本〈说文解字〉》《陶刻孙本〈说文解字〉正误》等《说文》相关著述。汇集《广韵》二十几种刻本、残卷,逐一对校,刊定纰缪,终成《广韵校本》,乃传世之作。对训诂书《方言》《尔雅》《释名》进行校勘,成《方言校笺》《尔雅校笺》《释名校笺》。至此,被喻为训诂学“根底”书、“资粮”书的四部经典名著,周先生已全部继承、汲取并发扬光大。

除汉代经典外,周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字书、韵书、训诂书均有承继,特别是清代小学,更不待言。如著有《影印〈古韵标准〉前言》《影印〈六书音均表〉前言》《影印〈音学五书〉前言》《影印〈诗声类〉前言》《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论段氏〈说文解字注〉》《读王氏〈广雅疏证〉手稿后记》《〈广雅疏证〉录遗》《陈澧〈切韵考〉辨误》,若不深谙各种典籍,绝不可能作出如此精核之“前言”“后记”。吴小如先生谓“学本段王”,^②诚有以也。

周先生继承传统,不仅仅限于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著作。周先生继承传统是广泛的,这在其校勘古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与证明。他(2022[2]:8)说:“校勘古书所需要的一般知识是相当广泛的;一方面要有关于古书的书籍知识,如古书的体制、古书的传写、古书的版刻以及有关书籍目录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有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知识,包括文字的假借、字体的流变、古今声韵的通转、词义的引申等等。除此之外,对古代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之类也须要有所了解,并能运用不同种类的工具书,以解决书本上所出

① 收入《问学集》时更名为《〈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

② 学本段王,哲人竟萎,门盈桃李,薪火难传。——吴小如挽

现的问题。然而各门学科又各有专门知识,校某一类书,就要有某方面的专门知识,自不待言。”因此,传统之版本、目录、纸张等知识,周先生均了然于胸。

(二)汲取现代

在周先生的学术道路上,罗常培、沈兼士对其影响甚大。周先生(2022[2]:680)说,“就专业而言,小学方面承受于沈兼士先生者多,语言学方面承受于罗莘田先生者多”。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中国近代杰出的语言学家、史学家,卓越的教育家,还是一位诗人。沈先生精于文字训诂之学,善书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沈先生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思想开阔,对西方的科学文化也非常重视。在学术上他不是一位抱残守缺的学者,而是博识古今中外的通人。他“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戴震语)。周祖谟先生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沈先生讲授文字学概要和《说文解字》研究。文字学概要以朱宗莱《文字学形义篇》为教材,“每次上课,他抒发己见,对于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前代有关文字学的书籍都提出个人的看法,以启迪学生进行思考,勿为旧说所有;同时拈出问题,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如何进行研究,举一反三”(周祖谟,2022[2]:626)。沈兼士嘱周祖谟从张之洞《书目答问》入手,首先要有广博的书籍知识,然后由博返约。沈先生识见宏通,主张从形音义三者贯串证发推考字义。沈先生授课,不为旧说、旧本所囿,重视科学理论,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证。沈先生讲课中最可贵的是“为学生指出问题之所在、研究的方法以及须要参考的书籍,并且评论其得失利弊”(周祖谟,2022[2]:632)。沈先生对待学术,重视科学方法,重视实证,重视材料,不随心所欲地推测。周先生概括沈先生的治学精神有二:其一是不专信书本而重实证;其二是今古相参验,综合比较。其方术,则纵横兼顾。纵即探本溯源,横即取资现代。在语言学上,沈先生提出要探求语源,做语根的研究,建立语源学;同时,他又主张调查现代方言,建立方言学。沈先生授课的方式、治学的严谨态度、深入探讨的精神,对周先生有极深刻的影响。如周先生在述及沈先生授课特点与讲课中的可贵之处时,就明确说,“我感觉在这方面受益最大,也最多”(周祖谟,2022[2]:632)。

罗常培(1899—1958),族源为吉林宁古塔萨克达氏,后裔分罗、老、苍三姓,满族正黄旗人,与爱新觉罗氏无关系,生于北京。罗先生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卓越的语言学家,蓄积深,成就多。他除了在汉语历史音韵学方面有超卓的贡献以外,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也都有精湛的专门著作。罗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周祖谟,2022[2]:619)。

罗先生1916年报考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毕业后转入哲学系继续学习。1921年受聘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1926年秋从鲁迅、沈兼士于厦门大学讲学,大约1928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中山大学任教时,赵元任调查两广方言,罗与其日夜讨论一周,打下音韵学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入所做语言组研究员七年。据罗常培(1984:433),七年间(1928—1934),他在学术上受赵元任、陈寅恪、李方桂启发颇多。1934年回母校北大服务,同时借聘中央研究院,从1937年起就专任北大教职,中央研究院改为通讯研究员。

罗先生到北大后,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和文学院中文系的本科生开设了“语言

学”“语音学”“语音实验”“音韵学”“域外音韵学论著述评(高本汉之《中国音韵学研究》)”等课程,相互证发,学者都感觉耳目一新。周先生是罗先生的得意门生,罗先生是周先生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二人合作完成《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因此,罗先生对周先生影响极大。周先生(2022[2]:619)回忆说,“我在学过文字、声韵、训诂等学科之后,又增添了不少语言学的知识,后来撰写毕业论文时,又亲承教诲,受益就更多了”。^①罗先生在1931年秋即与赵元任、李方桂共同释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33年在《音韵学研究方法》中提出审音、正名、明变、旁征四种方法^②,“所谓‘审音’,就是要有现代语音学的知识,能用国际音标记录、分析古代音韵;所谓‘明变’,就是要注意语音在时间、地域上的差异,明了音韵演变的条理;所谓‘旁征’,就是要向现代汉语方言以及汉藏语系亲属语言寻求古代汉语语音的证据;所谓‘祛妄’,就是要革除传统音韵学‘玄虚、含混、附会、武断’四大毛病,使音韵学成为真正的现代科学”(刘宝俊,2020:66)。^③

罗先生的现代语言学思想对学生的影响,从严学窘身上也能体现出来。1934年严学窘进北大读研究生时,周先生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因一起听罗先生的课而相识,又因共同爱好,志趣相投,结为知己。罗先生讲语言学和音韵学,“充分运用现代语言学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严学窘影响最深的是,他用欧洲语言学、语音学的理论、观点、方法和工具,分析现代汉语方言语音,讲述传统汉语的音韵问题。他以语音学作为音韵学的先导,许多传统音韵学含糊不清、混淆已久的问题,一经他从语音学角度作出分析,无不涣然冰释,令人顿悟”(刘宝俊,2020:59)。严学窘在三年研究生期间,在罗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学会了“现代科学的方言研究方法,学会了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工具——国际音标记录、分析、整理、归纳汉语方言音系”(刘宝俊,2020:59—60),因为罗先生教学生语音学和音韵学,首要就教学生运用国际音标辨识、记录自己的方音。据刘宝俊(2020:64),严先生还学会了运用“反切系联法”研究中古音,写成《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一文,严先生在该文后注曰“承罗莘田(常培)、魏建功二位先生恳挚指导,周燕孙祖谟匡助订正,谨此郑重致谢!”周先生晚年(1992)追忆严学窘时说:“我们同时听罗莘田先生讲课,一见如故。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语言方面的问题,课下接触也多,他那温和谦逊好学的态度感人至深。”严学窘晚年(1993:28)回忆周祖谟说:“(他)与我有近六十年的交情,从未中断,是难得的知己。我们在北大同学,他是莘田师的得意高足。当时北京大学流传着两句口头禅:‘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这是北大中文系培养的两位天才学者。……北大的老师都想把周先生收在自己门下。一九三四年秋,周先生读大学二年级,年仅十九岁,就在北大《国学季刊》上发表了《说文解字之传本》一文,得到了著名语言文学家沈兼士先生的嘉许,曾赠以‘高轩谢车马,小学主昆鱼’一联,是沈先生用甲骨文写成,可见他对周先生的赏识。后来周先生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教研究员,对文字、音韵、训诂无所不精,同时擅长诗词歌赋。其特长是精于考据,长于校勘,治学特点是精、细。”可见,周先生得到了罗先生的亲炙。

罗先生(1984:433)曾说:“《两汉三国南北朝韵谱》,1933年已开始作,参加工作的有丁声树、周殿福、严学窘、吴晓铃,后来交给周祖谟整理。昨天周把稿子交来,但第二、三、四章

① 周祖谟《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纪念敬爱的罗常培先生》,这是1983年在北京市语言学会纪念罗常培先生逝世25周年会上的发言。

② 罗常培《音韵学研究方法》(上、下),《出版周刊》新80、81号,1933年。

③ “祛妄”即“正名”。

没有写完,如何校对很成问题。”由此可见,周先生很早就参与了罗先生的研究。

后罗先生又于1944—1948年赴美国朴茂纳大学、耶鲁大学讲学、选修课程,其《自传》(1984:417)说,“对于美国语言学界的情形总算有了相当的认识”。此外,罗先生还与赵元任先生、李方桂先生合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曾著《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普通语音学纲要》《域外中国声韵论著述评》《汉语音韵学的外来影响》。综上可知,罗先生一定深谙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及历史比较法,而这一定会影响到周祖谟先生的研究。

我们从罗常培、魏建功先生(1984:381—382)所拟的“中国文学系语言文字学组课程总纲”中,也可看出周先生传统与现代并重的学术背景。如下表:

中国文学系语言文字学组课程总纲

罗常培、魏建功谨拟

甲 中国语言学		
A 语言		
一	* [○] 语言学(2.3)	二
二	*语义学(训诂)(2.3)	二
三	* [○] 中国训诂学史纲(3)	二
四	方言研究	二
五	东方语言研究	
六	*汉语学择题研究(联绵格、殷周词类)(3.4)	二
七	* [○] 中国文法研究(古文法、现代语法)(3.4)	二
B 声韵		
一	* [○] 语音学(附实验)(1.2)	二
二	* [○] 中国声韵学概要(横的叙述)(1)	二
三	* [○] 中国声韵学史纲(纵的叙述)(2)	二
四	*古音考据沿革(3.4)	三
五	*韵书系统(3.4)	三
六	*等韵图摄及音标运动(3.4)	三
七	域外中国音韵学论著研究	二
八	方音调查实习	二
九	*声韵学择题研究(汉魏六朝音)(3.4)	二
乙 中国文字学		

一	* [○] 中国文字学概要(1)	二
二	* [○] 汉字变迁史纲(2)	二
三	* 中国文字学史(3.4)	三
四	* 古文字学导论(3.4)	二
五	甲骨文字研究	三
六	钟鼎文字研究	三
七	* 文字学择题研究(3.4) * [○]	二

注:加*者必修。分年者加1.2.3.4字样。

照分年必修之规定如有应修未修者,必须补修。

教育系辅系生选习科目加○,除一年级功课须必修,余为选修。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周先生重在传统。但并不是说周先生不重视现代,弱于现代。其实,周先生在音韵学研究中,曾构拟了宋代汴洛语音和唐代声母系统。周先生曾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中强调语音学、历史语言学的重要性。所以才有《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等历史音韵之作。此外,方音史、训诂学史、汉字史、汉语史、辞典学史等“史”,都在周先生关注范围之内。

二 学术特点:三科贯通,精于文献

文字、音韵、训诂融会贯通。一方面,周先生精通三个学科;另一方面,周先生在研究中将三个学科贯通。周先生(1980,2022[2]:346)说:“一方面要打通文字、音韵、训诂三者的界限,融会贯通;另一方面要扩大研究的范围,从多方面的材料入手。”^①周先生的研究,范围既广,方术多门,深而广,博而精。

(一)三科贯通

据周先生《自传》,他于1932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从当时著名的语言学家如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刘复、罗常培、魏建功、唐兰等学习文字学、声韵学、语音学、语言学等课程,购置《广韵》和陈澧所著的《切韵考外篇》,反复研习琢磨,并与口音相证,颇有领悟,由是兴趣也逐渐浓厚起来,进而学习等韵和古韵,于1937年完成《广韵校本》并附《广韵校勘记》。周先生用心较多者有《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诗经》《楚辞》等,详读段注,参照甲骨文、金文写成《〈说文〉部首解》一卷;《尔雅》《方言》有郭注,有清人新疏且不止一家,各有短长,故取诸家之书对读,各有校笺;周先生认为清人毕沅、王先谦不能理解刘熙作书之旨,故

^① 周祖谟《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途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讲话,1980年10月,湖北武汉。

偶作札记,成《释名校笺》;于《诗经》,陈奂《传疏》不肯以笺破传,专重家法,其训诂反不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宏通,遂参王先谦《诗三家集义疏》撰写《诗经纂义》,裁夺各家所说。周先生谓其业务专长为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汉语史以及古典文献学、目录学、校勘学,在辅仁六年先后讲授语音学、等韵学、高本汉《中国音韵学》、比较训诂学、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尔雅》、《方言》、《说文》、《释名》、《楚辞》、《洛阳伽蓝记》等科目。由此可见先生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且三科贯通。周先生研究领域广及音韵、文字、训诂、词汇、方言、语法、词典编纂、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版本、目录、校勘、敦煌学、文学、史学等。周先生博综群书载籍,淹贯经史百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编写组(2004;2025)总结为“音韵、训诂是其学术成果最丰硕的领域,古籍整理与校勘也是其尤为擅长的”。

(二)精于文献

周先生深厚的文献功底令人折服。周先生学术眼光如炬,极善发现并利用新材料。其所擅长之古籍整理与校勘,一赖对文字、音韵、训诂的融会贯通,二赖前人所未见之新材料的使用。利用新材料,周先生《广韵校本》《尔雅校笺》《唐五代韵书集存》《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等等皆为明证。1972年及其后数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与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其中多数为战国秦汉间古书写本,“各书通假字之多不胜枚举”,周先生以其超乎寻常的学术敏感,作出了引领学术潮流的重大举动,于1980年写成《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长文^①,鲁国尧先生(2011)认为“它开拓了音韵学与新近出土不久的简帛文字研究相结合的一条新航线,可谓得风气之先,影响深广”。周先生提出“研究古音韵的人不能不懂古文字”。^②

周先生博览群书,凡校勘,必考证,皆有凭据,莫不原原本本索其根由,未尝率尔立论。他认为校书之事,最忌臆断。应当实事求是,多闻阙疑。要做到“不拾前人牙慧,而遽以立论;不执一时之成见,而附以深文。揆之于本书而协,验之于群籍而通”(余嘉锡,2011:183),“若意虽以为未安,而事却不可尽考,则姑云未详,以待论定”(余嘉锡,2011:263)。既不可厚诬古人,亦不能贻误后学。

周祖谟(2022[2]:12)说,“要校书就不能不多聚众本,寻求足本、善本,校其异同”,“至于敦煌石室所出的唐写本古籍,数量较多,虽然也不免有错字,然远胜于宋以后的刻本。我们应当尽量利用古本来刊正今本”。多聚众本,援据群书,探微索隐,详为论证,无间毫发,释疑解惑,故而周先生之校勘校笺迈越前人者多。

三 学术特点:语言学与校勘学互为表里

校勘之事,始于二刘,郑、章诸贤《校雠略》《通义》之作遂言及校勘,余嘉锡谓“目录、版本、校雠(即校勘)三者一家之学”。吴孟复(2013:1)谓王念孙《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

^① 该文完成于1980年,发表于《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

^② 周祖谟《关于研究音韵学的几点希望》,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开幕式讲话,1982年8月,陕西西安。

《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均训诂与校勘相表里。周先生则语言学与校勘学互为表里，而精要在于校勘学与音韵学相得益彰。周先生家离琉璃厂不远，从小学到中学，每年春节期间的“厂甸儿”“厂肆”，周先生几乎每天都去这些书市看。中学十六七岁时，周先生即读《楚辞》《文选》《古文辞类纂》《史通通释》《书目答问》《杜诗详注》之类。这些对周先生后来的版本目录学识大有裨益。“厂甸儿”的书籍、字画、文玩、古物等给周先生增添了不少知识。周先生在大学二年级(1933)时听取了沈兼士先生讲授的《说文解字》，由此得知为学门径，并在《书目答问》的指引下，开始校勘《说文解字》，写成《〈说文解字〉之传本》，可见，周先生之学问始于校勘。大学三年级时又受刘文典校勘学之影响，得窥校勘门径。大四临毕业，受中研院史语所委托校勘《广韵》。大四毕业论文《〈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为音韵之作。可见，大学阶段即奠定了周先生语言学与校勘学互为表里、而以校勘与音韵为其核心的治学特点。

周先生对校勘学有独到的见解与体悟。何为校勘？“‘校’是比对异同的意思，‘勘’是审核订正的意思。‘校勘’就是以两者互相校核，发现异同，而正其讹误”(周祖谟，2022[2]:7)。周先生《论校勘古书的方法》(1936)、《古籍校勘述例》(1979)两文都详细论述过校勘古书的方法。在《古籍校勘述例》中，周先生体悟到校勘古书需要有相当广泛的知识，但文字、音韵、训诂与校勘学是互为表里的。他(2022[2]:8)说：“一方面要有关于古书的书籍知识，如古书的体制、古书的传写、古书的板刻以及有关书籍目录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有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知识，包括文字的假借、字体的流变、古今声韵的通转、词义的引申等等。”此后，周先生多次强调语言文字之学在整理古籍中的重要性，“整理古籍，语言文字(也就是“小学”)功夫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能谈到专门知识”，“文字、音韵、训诂，都十分重要”(周祖谟，1982)。“搞古籍整理必须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周祖谟，2022[2]:34)。因此，鲁国尧先生(2011)说：“周先生的校勘著作里，蕴含着语言学的矿藏；而在语言学论著中，包容了校勘学的成果。”周先生主要的学术成就在音韵学领域，而音韵学领域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对音韵学典籍的校勘。如《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唐五代韵书集存》等。

下面以非语言学的古籍《洛阳伽蓝记》为例，说明周先生语言学与校勘学互为表里。例子均出自周先生《洛阳伽蓝记校释》。

“扶疎簷溜，藁竹香草，布护堦墀。”(卷一 城内“永宁寺”)

《校释》：各本作“扶疎拂簷”，此依《内典录》。“簷溜”与下“堦墀”为对文，自以作“檐溜”为是……扶疎布护皆叠韵字。(周祖谟，2022[7]:5)

按：周先生以训诂学之“对文”佐证其校“拂檐”为“檐溜”。

“路断飞尘，不由淪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卷一 城内“永宁寺”)

《校释》：“淪”今本均作“奔”，误。此从《续僧传》改。《内典录》作“淹”，亦非。《诗·小雅·大田》云：“有淪凄凄，兴雨祁祁。”(“凄凄”，今《诗》作“萋萋”，此从《韩诗外传》及《吕览·务本篇》。)《传》曰：“凄凄，云兴貌。”《正义》曰：“天将降雨，则地气上腾，薰蒸为湿润，淪浸万物。”《说文》曰：“淪，云雨貌。依俭切。”案此云“淪云”，正用《诗》义，谓含雨之云也。言绿树交荫，翛然清寂，不待湿云润泽，而飞尘自绝也。(周祖谟，2022[7]:7)

按：周先生据《续高僧传》校“奔”为“淪”。以《诗》之《毛传》《正义》及《说文》释其所校“淪云”正用《诗》义，若作“奔云”则龃龉难通。

“虽迫于凶手，势不自由；或貳生素怀，弃剑猜我。”(卷一 城内“永宁寺”)

《校释》：“貳”，原空阙，《津逮》本作“貳”。《逸史》本作“诉”。案作“诉”文义不通。貳者，携貳也。或为“資”字之误，“資”与“貳”字通，貳者，变也。（周祖谟，2022[7]：18）

按：周先生据《津逮》本补“貳”，并谓《逸史》本作“诉”非，因文义不通。校为“貳”或“資”之误，文义方通。

“銜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卷一 城内“永宁寺”）

《校释》：“凝”原作“宜”，音义而讹。别本不误。（周祖谟，2022[7]：24）

按：“凝”周先生校改为“宜”，指出致误之因是“音义而讹”，并以“别本不误”佐证。

“羽徒纷泊，色杂苍黄，绿头紫颊，好翠连芳。”（卷二 城东“正始寺”）

《校释》：“纷”，《逸史》本作“分”，孙校同。案《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云：“毛群陆离，羽族纷泊。”刘逵《注》曰：“毛群，兽也；羽族，鸟也。陆离，分散也；纷泊，飞薄也。”李善《注》：“泊，匹各反。”是字当作“纷”。纷泊乃双声连语，与陆离相同。羽徒者，犹言羽族也。（周祖谟，2022[7]：63）

按：周先生校改“分”为“纷”，所据为《文选》左思《蜀都赋》之刘逵注、李善注，并指出“纷泊”为“双声连语”。

“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攢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井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卷二 城东“景宁寺”）

《校释》：“垫”原作“蛰”。案字当作“垫”，垫下湿也。《释名·释地》云：“下湿曰隰，隰，垫也，垫垫湿意也。”“垫”，今本作“蛰”，亦误。《原本玉篇》隰下引作“垫”，是也。（周祖谟，2022[7]：73）

按：周先生据《释名》校改“蛰”为“垫”，并指出今本作“蛰”亦误。最后以《原本玉篇》佐证其校。化振红（2001：174）谓湿、隰、垫同义，“垫”还含有位置低下之义，《方言》卷六：“湿、垫，下也。凡柱而下曰湿，屋而下曰垫。”“湿”是一般性的潮湿，“垫”则是低下而潮湿。

四 治学方法：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并用

耿振生（2016：294）总结的传统方法包括“韵脚字归纳法”“反切系联法”“谐声推演法”“异文通假声训集证法”，现代方法包括“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译音对勘法”，“审音法”“统计法”则属于半传统半现代的方法。此外，应该还有“历史文献考证法”或“文献考证法”。很显然，周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传统与现代并用的。周先生文献考证之精要、影响，已为学界所共知，多数可为“典要”，均赖“文献考证法”。正因周先生文献功底深厚，擅长传统方法特别是文献考证，而对周先生的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方法如历史语言学、历史比较法方面的造诣，学界认识并不全面，甚至有误解。如李方桂先生（2003：71）即认为，“他是典型的中国派语言学家，他对西方语言学毫无兴趣。他至今依然如此。他要写的东西总是关于《切韵》，关于汉语语言学”。笔者认为，此言不合周先生事实。可以说，周先生一生的学术兴趣与学术重点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字之学，但并不能说周先生对现代语言学及其方法毫无兴趣。于历史语言学，于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我认为，周先生非不能也，不为也，或不重点为也。

首先,历史比较法所处理的材料包括活语言与文献。

陈忠敏(2022:5-6)认为,“历史语言学是通过亲属语言的历时比较,或语言内部变异的分析来研究语言的演变、语言演变的规律,总结研究语言演变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学科”,有如下四个任务:一是构拟原始语言;二是解释从原始语言到各子语言的演变;三是亲属语言的谱系分类;四是语言演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整理历史文献是历史语言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历史语言学里常用的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所用的材料不仅有活语言的材料,也有古文献的材料,而早期的印欧语研究更多的是用古文献材料。印欧语有非常丰富的古代文献,早期的印欧语历史研究主要依靠文献,死的文献。我们所熟悉的 Grimm's Law, Verner's Law, The Law of Palatals, Grassmann's Law 都是历史比较法的成果,这些成果最重要的依据是对古希腊史诗和古梵文的分析。可见,历史比较法包括对古文献的考证。虽然梅耶认为,只有对现代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建立起语言史,但徐通锵、王洪君(2008:29)认为梅耶关于书面文献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价值否定过头了,他们认为,“在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不是要抛弃书面文献材料,而是要用现实的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面‘死’材料作出‘活’的解释”。可见,历史比较法绝不能抛弃“死”文献。“我们大概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语言的演变:a.通过亲属语言(方言)的比较寻找语言的演变的途径。b.通过同一语言(方言)里历史文献所反映的差异了解语言的演变。c.通过同一语言(方言)共时的变异也可以研究语言的演变。我们往往用历史比较法来处理 a、b 两种材料(历史比较法也适用于历史文献),用内部拟测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和变异理论来处理 c。死语言(文献)和活语言各有利弊,可以互相结合起来用”(陈忠敏,2005)。

徐通锵、叶蜚声(1981)指出,“内部拟测方法实质上就是运用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发展,想从语言材料的共时分析中得出历时的结论”。内部拟测方法的根据是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和语言成分发展的不平衡性。高本汉是最早运用内部拟测法拟测上古音系统的学者。高氏充分利用前人特别是清儒研究成果,把文献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韵母方面以清儒上古韵部为框架,声母方面以谐声系统为根据,并把《切韵》音系与上古的音类作比较,由此拟测上古音系。其中的谐声系统,即来自文献(虽然其谐声取材于《康熙字典》而非《说文解字》)。高本汉也是最早运用历史比较法全面构拟中古音系统的学者。他所用材料有四:一是方言材料;二是译音对音材料;三是反切注音材料;四是各种带解说的韵表。高氏对第二、三类材料相当重视,而这两类材料正来自文献。可见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从来不排除文献,相反对文献相当倚重。

其次,周先生重视历史语言学。

周先生对历史比较法及历史语言学寄予厚望,认为以历史比较法进行汉藏语比较研究,是今后音韵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周先生(2022[2]:346)说:“壮语、苗语、藏语、嘉戎语、羌语都有人研究过,如果能应用语言历史比较法与汉语对比,找出历史上的关系,探寻汉语语音在历史发展上从文字本身难以发觉的踪迹,那确是一大贡献。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周先生重视的现代普通语言学,一个是语音学,另一个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周先生(2022[2]:344)说:“研究汉语音韵不能不借助现代的普通语言学。一个是语音学(phonetics),一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周先生也很重视现代方言,周先生(2022[2]:344)说:“历史音韵的研究要与现代方言相互证发……不大力从事方言的研究,就不能说明古今的音转和音变。许多语言的演变规律,就蕴藏在方言之中。”周先生师从罗

常培,罗先生曾与赵元任先生、李方桂先生合译过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而罗先生又曾留学美国四五年之久,这些对周先生不可能没有影响。

再次,以下事实证明周先生有懂历史语言学与历史比较法的可能。

向赵元任先生请教。1936年,22岁的周先生大学毕业,考入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于8月南下南京,得谒赵元任先生,承蒙恳切指导将近半年。

1936年在史语所与董同龢先生论学。周先生在史语所,与董同龢先生同室,“朝夕相处,研讨音韵,大有论学之乐”周祖谟(2022[2]:673)。董先生懂历史语言学与历史比较法,当无疑义。

周先生1939—1946年在辅仁大学讲授“语音学”“高本汉《中国音韵学》”,为《广韵声系》加注高本汉中古音拟音。高本汉懂历史比较法,当无疑义。

最后,周先生在实际研究中运用了历史比较法与内部拟测法。

《宋代汴洛语音考》,周先生取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以及汴洛文士诗文用韵如邵雍《击壤集》等材料考证韵母,并和现代开封方言的声、韵、调相比较,构拟了宋代汴洛地区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确定其音系性质。该文当是死语言(文献)与活语言(开封方言)结合的典型论文,应是历史比较法的典型操作程序。

《五代刻本〈切韵〉及其声母的读音》,周先生构拟了这个刻本的声母系统:

p	p'	b	m			
t	t'	d	n	l		
t̪	t̪'	d̪				
ts	ts'	dz	s	z		
tʃ	tʃ'	dʒ	ʃ			
tɕ	tɕ'	dʑ	ɳ	ɕ	z	j
k	k'	g		h	ɦ	

此外,周先生《〈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分别对原本《玉篇》音系、唐五代北方语音23摄、汉代竹书帛书通假字所反映的上古声母系统进行了构拟。

由上可见,周先生不仅擅长传统方法,亦以现代语言学如历史语言学理论及内部拟测法、历史比较法等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古文献、拟测古音。只不过,周先生的学术重点在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在古籍校勘与整理。于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非不能也,不为也,或不重点为之也。

耿振生先生(2016:290—302)认为“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相结合”“文献材料与活语言材料相结合”“内部分析和外部考察相结合”是研究汉语音韵史的三条通例,周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此三条通例密合无间,无怪周先生能取得重大成绩与突破。

五 学术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历史发展的观点

罗常培与周祖谟先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在处理据以研究两汉音的材料时,两位先生明确提出,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历史发展的观点。因为,赖以研究两汉音的材料有韵文、声训及汉人著述中的音读。韵文包括诗文押韵与子史中的韵语,声训材料集中于《白虎通义》和《释名》,汉人音读包括读若、直音和反切。两汉材料中,西汉材料较少,东汉材料较多,又因声音正处于逐渐转变之中,现象错综复杂,甚至同一作家的作品在用韵上也不一致,尤其是两汉辞赋的句读和韵例也非常复杂。面对如此材料,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历史发展的观点。

清人在讨论周秦音时,每及两汉音甚至魏晋音,就因缺乏历史观点,把西汉、东汉混为一谈,致错漏百出。如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表一“今韵古分十七部表”说“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部,汉以后多四部合用,不甚区分”,又说“……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部,三百篇及群经屈赋分用画然,汉以后用韵过宽,三部合用”。但实际情况是,两汉时真文合一,与元分立;侯鱼合一,与幽宵分立。并且西汉与东汉不尽相同,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分别看待。段氏所论只有部分正确,并不严密。

周先生在研究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时,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历史发展的观点。魏晋南北朝正处于历史大动荡时期,期间战乱频仍,朝代更迭,民族融合,人民迁徙。面对如此宏大之时代,材料较两汉显然更为复杂。要讨论此期之方音,作家之郡望里贯与实际出生地、生活地并不一致,若不坚持实事求是之精神,显然不可能探寻此间方音之真相。

周先生根据诗文押韵实际,结合史实,把魏晋宋分一期,齐梁陈隋分一期,显然也是坚持实事求是与历史发展的观点。

据诗文押韵,魏(三国)时期分33部,晋宋时期分39部,齐梁陈隋时期分55部,似是三个时期,但周先生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把魏(三国)晋宋分为一个时期,齐梁陈隋一个时期。因为语音史的分期只是一种简单的概括,不能区分过细。周先生(1996:8)说:“严格说起来,同一个时代各地的语音都不尽相同,那么,把不同的时代归为一个时期,那只能从大类相近着眼。即如魏晋宋一个时期里,魏只有阳声韵的分部接近于两汉,阴声韵和入声韵的分合则变动很大。论其部类,跟晋宋相近,所以把魏与晋宋合为一期。宋代阴声韵的分类虽然跟晋代大体相同,而阳声韵和入声韵的分类则跟晋代出入甚多。宋代正是由魏晋音发展为齐梁音的过渡阶段,也就是上承魏晋,下启齐梁。因为齐梁音的韵部呈现一种新的格局,不同于晋宋,所以定魏晋宋为一个时期,齐梁为另一个时期。”

歌支鱼侯在两汉的分合,周先生也是根据诗文押韵的实际来判断的。西汉歌支一部,鱼侯一部。至东汉则歌支分立,鱼部麻韵字转入歌部。周先生(2022[2]:459)说:“此非综错比类,寻按全体,不得其详。”^①周先生举出的诗文押韵例证是:枚乘《七发》以“枝离溪”为韵,司马相如《子虚赋》以“堤蟺施鹅加池”为韵,又“崖陂波”为韵,“鸡臙”为韵。中山王胜《文木赋》

^① 周祖谟《研究汉代诗文韵读之方法》,作于1940年,(北平)《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4期)1946.11.13;(读书周刊15期)1946.11.20。

以“崖枝雌啼仪知斯”为韵,东方朔《七谏·哀命》以“知离”为韵,扬雄《蜀都赋》以“崦倚崎施倚岢嶰”为韵,又“蚺鱗”为韵,“多桅蒿斯”为韵,这就是西汉韵文中歌支两部合为一部的例证。又如枚乘《七发》以“腴蒲肤”为韵,司马相如《美人赋》以“徒车隅居娱”为韵,中山王胜《文木赋》以“孟蛛旦”为韵,扬雄《解嘲》以“搜涂候铁书庐”为韵,这是鱼侯为一部的例证。又如傅毅《洛都赋》以“华波罗”为韵,班固《答宾戏》以“波华”为韵,张衡《西京赋》以“家过加”为韵,又“家华何”为韵,蔡邕《祖德颂》以“加荷华”为韵,这是东汉韵文中鱼部之麻韵字转入歌部的例证。^①

以上所论,若非坚持实事求是与历史发展的观点,是难以做到的。

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在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历史发展的观点。如语音史著作有《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以及《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魏晋音与齐梁音》《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方音史著作有《汉代的方言》《魏晋时期的方音》《齐梁陈隋时期的方音》《唐五代的北方语音》《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的一些资料》《宋代汴洛语音考》《宋代方音》《鞞公〈楚辞音〉之协韵说与楚音》《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切韵〉与吴音》《射字法与音韵》;学术史著作有《古韵学顾江段孔四家书述评》《吴棫的古韵学》《陈澧〈切韵考〉辨误》《影印〈音学五书〉前言》《影印〈古韵标准〉前言》《影印〈六书音均表〉前言》《影印〈诗声类〉前言》《读〈守温韵学残卷〉后记》《邹汉勋〈五均论〉辨惑》《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论段氏〈说文解字注〉》《徐锴的〈说文〉学》;文字学史著作有《中国文字学发展史》《汉字发展的历史》;训诂学史著作有《中国训诂学史》;汉语史著作有《汉语发展的历史》;词典学史著作有《略论近三十年来中国语文词典编纂法的发展》《中国辞典学发展史》;等等。

周先生曾有专文讨论治学态度、治学方法。虽是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但亦是周先生毕生之治学经验与精髓。在该文中,周先生(2022[2]:855)从五个方面谈治学方法。第一,治学要有根基;第二,为学要有次第;第三,为学要靠平日积累;第四,注意从搜集材料入手,然后进一步参互比证。周先生说:“治学要善于参照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证,经过考释,而后作出决断,那才是真正有所得。”由此可见,搜集材料,参互比证,是极为重要的治学方法;第五,治学态度。周先生归纳了五点:①态度要认真,不可粗鲁;②重观察,重实证,不能凭空悬想;③重分析,要实事求是;④重精审,要切磋,不墨守成规,不蔽于自见。不要自以为是,拘守一家之说;⑤重条理,避免驳杂。

另外,周先生(2022[2]:682)说:“平生治学重在汲取前人研究的成果,深入研究,从观点和方法上衡量其得失,进一步利用多方面的材料钩深致远,解决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涉及的问题。对待不同的学科,重视其科学性和系统性,把有关的学科结合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倡导和推进学术的发展。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可见,周先生重视前人成果,重视多方面材料,重视科学性和系统性,学科发展与历史发展结合,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这是周先生的治学方法。

周先生一生治学范围极广,除前述各方面外,周先生于版本目录、国学文史、文字改革、

^① 周祖谟《研究汉代诗文韵读之方法》,作于1940年,(北平)《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4期)1946.11.13;(读书周刊15期)1946.11.20。

汉语规范化、汉语拼音推广、标点符号使用、语文教学、诗词书法、写作修辞等领域,或有专文论述,或有实践创作。故而,鲁国尧先生总结周先生治学特点是“广大、精深、创新”,“他出入于音韵、文字、训诂、词汇等语言学的诸分支学科,相互会通,皆有重大创获;他又是卓越的校勘家,治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又擅敦煌学、文史之学的领域:这是周祖谟先生广大的一面。周祖谟先生在海量资料的基础上,作致密的考证,细入毫芒,精湛深邃;这是他的精深的一面。追求正确,追求完善,追求卓越,追求巅峰,此即创新,必能发人之所未曾发,言人之所不能言,而写出大量必传之作:这是周祖谟先生的创新的一面”。^①

周先生的治学具有典型的乾嘉学派学风,学术渊博,在文献语言学的整理与考据方面,现当代罕有能与其相敌者。周先生虽植根传统,但本身的学术思想是革新的,并不墨守成规,一味守旧,更非不顾事实,是古而非今。周先生注意运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他很擅长文献学方法,重视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将研究引向深入。我们斗胆以如下数语总结周先生之广博学问:

根植传统,汲取现代。博综载籍,淹贯经史。

音韵训诂,文字校勘。范围既广,方术多门。

文献考证,历史比较。广罗众本,参互比证。

精于考据,长于校勘。精耕细作,立论精审。

学术渊博,造诣宏深。泰山北斗,举世罕匹。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2016:3)曰:“古之以别集自见者多矣,而多不传;传矣,而不能久;传且久矣,而或不著;其传而久,久而著者,数十家而已。其故何哉?盖学有纯驳浅深,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我们相信,周先生之著,“其传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

参考文献

- [1]白兆麟.校勘训诂论丛[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 [2]陈修亮.卢文弨校勘学思想与方法[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1):41-45+62.
- [3]陈忠敏.有关历史语言学的一些基本问题[J].语言研究,2005(3):69-76.
- [4]陈忠敏.历史比较语言学[M].上海:中西书局,2022.
- [5]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校勘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8.
- [6]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M]//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文集:潜研堂文集(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7]耿振生.音韵学研究方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8]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9]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0]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M]//洪诚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11]化振红.《洛阳伽蓝记》词汇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1.
- [12]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3]刘宝俊.严学窘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14]鲁国尧.人文学科大家周祖谟先生的学术成就[M]//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① 鲁国尧《人文大家周祖谟先生的学术成就》,《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第192页。

- [15]罗常培. 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M]//傅懋勳等主编.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16]罗常培. 自传[M]//傅懋勳等主编.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17]梅祖麟. 比较方法在中国, 1926~1998[J]. 语言研究, 2003(1): 16-27.
- [18]庞光华. 何九盈先生学术述论[M]. 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22.
- [19]苏金智. 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20]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 [21]魏建功. 继往开来出力多——在纪念罗莘田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M]//傅懋勳等主编.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22]吴孟复. 校勘学教程·序[M]//管锡华著. 校勘学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23]吴文祺, 张世禄主编. 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 [24]徐通锵, 叶蜚声. 内部拟测方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J]. 语文研究, 1981(1): 65-82.
- [25]徐通锵, 王洪君.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评介[M]//梅耶著, 岑麒祥译.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
- [26]严学窘. 八十自述[J]. 语言研究, 1993(增刊): 1-109.
- [27]扬雄著, 华学诚、游帅译注. 方言[M]. 北京:中华书局, 2022.
- [28]余嘉锡. 古书通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 [29]张琨著, 张贤豹译. 汉语音韵论文集[M].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 [30]张涌泉, 傅杰. 校勘学概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 [31]张志毅, 张庆云. 理论词典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 [32]章宜华, 雍和明. 当代词典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 [3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 [34]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编写组.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35]周祖谟. 要培养整理古籍的人才[J]. 文献, 1982(3): 8-9.
- [36]周祖谟. 德业超卓, 永远为人所怀念——悼念严子君教授[J]. 音韵学研究通讯(内刊), 1992.
- [37]周祖谟. 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M].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6.
- [38]周祖谟. 周祖谟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22.

A Summary of Mr. Zhou Zumo's Linguistic Academic Thoughts

Yang Jianzhong

Abstract: Mr. Zhou Zumo is an outstanding linguist and philologist. He have plenty of work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Summarizing Mr. Zhou's academic thought of linguist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After in-depth study of *Zhou Zumo's Collected Works* (《周祖谟文集》), the article summarizes Mr. Zhou's academic thoughts from four aspects: academic background,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methods, and academic spirit.

Keywords: Zhou Zumo, Zhou Zumo's Collected Works, academic spirit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 2318 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邮 编:311121

E-mail: yangjianzhong197@163.com